

从主体性哲学的追寻到专门化哲学的建构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

王雨辰, 崔玉娟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反思、批判了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的教科书体系“以物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 形成了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 经历了从对主体性的追寻到对主体性的反思的发展过程, 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现代实践论哲学, 形成了诸多针对实践问题的专门化哲学, 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 而且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和机理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特质, 并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结合的理论成果, 是 21 世纪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键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专门化哲学;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8)05-0001-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8.05.001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是对“以物为本”的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批判, “主体性问题”和“人的问题”由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复探讨的问题, 并形成了诸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人学”等多种解释。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具体内容有所区别, 但其共同点则是要求摒弃“以物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 确立“以人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 体现为对主体性哲学的追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实践的展开, 以及国外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 我国学术界开始对主体性哲学展开了反思, 并进一步探讨主体间性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时代, 开启了诸多针对实践问题研究的专门化哲学和一系列新的研究论域。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 无论是对于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还是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时代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 也为中国马克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J013)

作者简介: 王雨辰, 哲学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 武汉 430073); 崔玉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奠定了前提和基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术界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教科书体系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正确的解读模式，教科书体系并非是根据马克思的著作编写而成，而主要是根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编写而成，斯大林在他主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教科书体系的解释模式是以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为基础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成以揭示整个世界的普遍知识和绝对本质为目的的知识论哲学，其根本目的是论证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这种解释模式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看作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1](P115-116)}。由于教科书体系解释模式脱离实践和辩证法，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的立场，不仅存在着割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统一的缺陷，而且必然导致在论证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同时，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虽然这种解释模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通俗化和传播方面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简单化、教条化的缺陷，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物为本”为价值取向的解释。同时，教科书体系的解释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对此，葛兰西在批评布哈林依照教科书体系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一书时指出：第一，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处在争论、探索和有待制定的阶段，像布哈林这样编一本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就决定了这部通俗教材给人的印象是“各种缺乏联系的因素的罗列堆砌，不管文字上怎样苦心经营巧妙编织，始终捏合不到一块儿”^{[2](P508)}。与其编一本不成熟的教材，还不如用准确的理论和历史的语言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科学的专题性阐述；第二，布哈林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之所以缺乏联系，主要原因是他脱离辩证法，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关于社会、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运用的结果，上述做法不仅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意，而且必然导致机械论、宿命论和神秘主义的错误。葛兰西的批评一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另一方面指出教科书体系脱离辩证法和实践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陷入到机械决定论和神秘主义的错误中。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外哲学文化思潮的涌入，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而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是从反思和批判教科书体系开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教科书体系的解释模式处于一统天下的局面的话，改革开放以后则出现了不同于教科书体系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尽管具体观点有所区别，但其共同点则是从主体、实践出发，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孙正聿教授在《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一书中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程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范式、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和90年代以后的后教科书范式三个阶段。教科书范式的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以此作为评判中外哲学、伦理学等哲学二级学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

准,不仅用教科书体系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用教科书体系去规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实践活动。虽然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并对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客观上要求对教科书体系进行改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进入到教科书改革范式的探索阶段,其突出特点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规律与人的历史活动、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探索的重大关系问题,并以这些重新理解的研究成果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3](P315)}。20世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继承了80年代教科书改革范式注重实践和主体性问题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本质展开了进一步探索,其结果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体系哲学,而是一种问题哲学,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过去的体系意识转向了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域得到极大拓展,形成了诸如文化哲学、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等新兴的研究领域,从而真正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现实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

可以看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的解释一统天下,到反思、批判教科书体系的解释模式,呈现出多元解释模式并存的格局。如果说教科书体系的解释模式的特点是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以探讨世界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为目的的知识论哲学,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话,无论是教科书改革范式还是后教科书范式,尽管其理论观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都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共同点。具体地说:第一,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不应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解释模式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与特质,教科书改革范式与后教科书范式则认为教科书体系的解释无法凸显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要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就必须立足于在近代哲学的断裂点上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现代哲学的观念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确立了从“实践”和“主体”向度重新思考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最终确立了现代“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寻找现象世界绝对本质的知识论传统,形成了以探讨世界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为目的的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一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强调追求绝对性和一元论;“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则肯定人及其实践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实践哲学思维方式以其流动性、生成性、历史性的特点超越了近代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绝对性和一元性,是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第三,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秉承教科书改革范式或后教科书范式的论者强调,长期以来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混淆了马克思主义教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区别,导致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几条原理,并把这些归纳总结出的几条哲学原理凝固化、僵化,严重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必须以实践哲学思维方式为基础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由此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人道主义”、“人学”等解释,这些解释虽然具体观点存在分歧和差异,但其共同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使命不是要探寻世界的普遍本质和绝对规律,而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问题,其理论体系应当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学说;第四,在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不仅使哲学真正起到了社会变革先导的作用,而且真正

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各种类型的“专门化哲学”研究。对于前者，陶德麟教授通过考察中国学术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和“三个有利于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指出，这三个问题的讨论都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这体现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决了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如果当时不重新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就无从起步。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一句话，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哲学的先导作用在这里应该说昭如日月了。”^{[4](P244-245)}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解决了认识的真理性问题，那么“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则进一步解决了实践的合理性问题，使人们明白了凡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就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三个有利于问题”的讨论则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关联问题，阐明了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述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三个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脉相承，层层推进的关系；对于后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达成共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追求体系哲学，而是一种以问题导向的哲学，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真正观照中国现代化实践，形成了诸如发展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等新兴“专门化哲学”，真正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联系，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日益繁荣和多样化的发展格局。

二

如果说教科书改革范式批判反思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是为了确立实践和主体的作用和地位，展现为对主体性哲学的追寻的话，随着主体性哲学在实践中运用导致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主体性哲学展开的反思传入中国学术界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片面强调主体性的缺陷，促进了中国学术界从对主体性的追寻进一步转换到对“主体间性”问题的探讨。

如果说近代哲学是以主体性为基础的认识论哲学的话，现代西方哲学则通过“语言学转向”，使哲学的主题从主体性问题转向主体间性问题，这种转向既有理论上的根源，也与主体性哲学在实践中带来的问题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西方古代哲学主要建立在人们经验观察的基础上，人类的自我意识还未充分觉醒和发展，人们只是朴素地论证世界的统一性这一哲学本体论问题；近代西方哲学建立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近代哲学家或者从主体的经验理性出发，或者从主体的先验理性出发，探讨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体现为一种以主体为基础的认识论哲学。但是，在近代哲学那里，主、客体关系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康德为了解决上述矛盾，通过“现象世界”和“物自体”世界的区分，主张在现象世界人类可以把握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但是对于作为绝对本质的“物自体”世界的把握只能依靠信仰，进一步凸显了近代认识论哲学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的困境。康德之后的近代哲学或者从主观唯心主义，或者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角度，解决康德提出的问题，其结果要么把世界看作是人的主观意志行动的结果，要么把世界看作是某种神秘的绝对精神创造的结果。现代哲学力图从两个向度解决近代认识论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一个向度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哲学的转向。实践哲学的转向确立了实践论哲学思维方式，这一哲学思维方式把主、客体的统一看作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另一个向度则是借助语言

学的转向, 深入探讨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形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从主体性哲学的实践后果看, 主体性哲学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能力, 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哲学支撑。但是它把主体和客体绝对对立起来, 不仅造成了工具理性盛行和人的生活世界被科学技术不断侵入, 形成了人们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危机, 人与人的关系日益紧张和异化, 而且也使得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和生态危机日益凸显, 并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正是在上述理论和实践双重背景下, 现代西方哲学突破了近代哲学仅仅拘泥于探讨主体性问题, 而把理论重心转向了对主体间性问题的探讨, 并深深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 胡塞尔较早展开了对主体间性问题的研究, 并深深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胡塞尔是从认识论的视角解决主、客体关系问题的, 他的主体间性理论分为早期的先验现象学和晚期的生活世界理论。其理论的主要目的不仅要求在强调自我主体性的同时, 承认他者的主体性, 避免唯我论的错误; 而且还要求正确处理由自我和他者所构成的世界中的交互性问题。前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自我主体如何看待他者主体性的问题; 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同主体之间如何展开认识活动和交互性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的主体间性理论被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理论家进一步引入人类社会历史领域, 核心是解决世界中自我和他人如何通过语言交流实现交互性活动和主体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问题, 从而实现了将胡塞尔的认识论立场转换到了本体论立场。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主体间性理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先对主体性哲学展开了批判。在他们看来, 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 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 祛除神话, 并用知识代替幻想”^{[5](P1)}。而启蒙运动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就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哲学, 以主体为中心的极权主义思维方式在倡导摆脱对神的束缚来实现人的自立的同时, 却反过来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束缚。这是因为启蒙理性所说的“理性”是脱离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 把知识等同于权力, 把认识自然的目的归结为支配自然, 这虽然使人摆脱了对世界的恐惧, 但也必然使人们丧失了对世界的惊诧、想象和思考, 进而把世界完全理性化、计算化, 从而使人们丧失了对价值和意义的追寻,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导致了启蒙的反面, 即人类受制于科学技术的控制, 最终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他们由此要求用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批判理性”代替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工具理性”。哈贝马斯赞同霍克海默等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但是又批评他们具有否定理性本身的倾向, 强调解决当代西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关键在于应当超越意识哲学主体中心论的思维范式来重建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是通过借鉴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 提出以普通语用学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 并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众所周知, 普通语用学是通过分析言语行为、交往职能, 探讨说话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 来探讨他们之间如何达到相互理解的规范性、一般性的前提条件的学说。哈贝马斯以此为基础, 通过区分语言和言语, 并强调普通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言语行为, 即通过言语行为的研究探讨人们如何建立交往关系。在他看来, 交往要想获得成功, 必须具备言说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实性和意向的真诚性三个条件, 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通过语言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发生联系, 并实现呈现事实、表达自我意向和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三大功能。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不同于意识哲学范式所说的以主体为中心的工具理性, 它是一种人们交往行为中的生活理性, 核心是“相互理解”。可见, 交往理性并不像意识哲学那样关注主体对客体本质的把握, 而是关于主、客体以交往为中介的知识, 是一种主体间性, 强调的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 以理解为导

向，遵循一定社会规范和对话的方式达成共识来协调人们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正是以此为基础，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只注重“劳动”这一范畴的重要性，忽视了文化、道德观念和规范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是一种具有工具主义倾向的社会理论。他由此吸收结构主义方法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部分，如果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系统，它由政治、经济和文化子系统构成，系统主要解决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工具理性问题。如果把社会看成生活世界的话，它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生活世界主要解决的是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社会进化就是社会系统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和社会规范结构不断理性化过程，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共同发展。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在于系统不断侵入人的生活世界，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体现为人们对现存社会的一切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只有用“交往理性”补充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能真正解决当代西方科学技术理性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通过平等协商赋予人的生活世界以价值和意义^{[6](P120-130)}。

在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研究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交往实践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命题。学术界通过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著作中对“交往”的论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论述了交往的内涵，即人与人的交往、人与社会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往，而且还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力发展、交往与分工、交往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交往与世界历史理论、交往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等问题，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本质上是一种“交往实践观”。这种“交往实践观”不仅是一种主体—客体—主体的关系模式，包含着主体性或主体间性，而且又具有社会历史性特征，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本质上也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7](P96-117)}。“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必然是既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又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交往理论和主体间性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形成了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生活问题、公共性问题、生态问题等现实问题研究的发展哲学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生活哲学研究、政治哲学研究和生态哲学研究等全新理论研究论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不仅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进入到 21 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以探讨公平和正义为主题的政治哲学和探讨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生态哲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学”。从政治哲学的研究看，主要是通过引进、评介西方政治哲学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最终导致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挖掘、整理和重构；从生态哲学的研究看，主要是通过探讨生态哲学的兴起与生态本体论、生态方法论和生态价值论等问题，以此为基础系统引进和评介西方以自然价值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哲学思潮，或者借鉴和认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哲学，或者借鉴和认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哲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尽管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两大流派的具体观点存在分歧和争论，但他们都撇开社会制度维度，而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从理论上都具有抽象的文化决定论的局限，从理论的价值立场上看，都忽视和否定资本、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是生态危机的真实根源，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的作用，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哲学。这就意味着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哲学，必然无法摆脱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理论上的西方霸权话语的束缚，既无法真正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更无法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直到我国学术界展开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上述状况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三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具体地说:

第一, 系统地回应了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具有生态思维、是否与生态学相矛盾的质疑。他们的质疑主要包括: 历史唯物主义秉承的是一种与生态思维相矛盾的二元论、经济决定论、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维, 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的存在,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唯科学主义和唯生产力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所设想和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限制相矛盾等。对于上述质疑, 我国学者展开了系统的回应, 阐明上述质疑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仅与生态思维不矛盾, 而且比西方人类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更有优势。

第二, 系统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和价值观批判。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具体理论观点存在着差异, 但其共同点都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 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的社会历史性和生态内涵。他们都对技术理性、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盛行与生态后果展开了分析, 把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

第三, 系统阐发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我国学术界特别重视对福斯特关于“新陈代谢”(物质变换)概念的阐发, 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的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危机和中断原因的分析, 阐发维系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个方面系统阐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第四, 重视阐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本质的阐发, 以此为基础探讨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生态文明虽然也是一种环境保护, 但它与工业文明条件下以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有本质的区别, 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环境保护没有改变以资本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控制和被控制、占有和被占有的工具性关系, 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不正义的本质。生态文明的本质由此被规定为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 使经济增长服务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同发展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因此, 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 而是对工业文明的积极扬弃。

第五, 阐发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启示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特质是坚持制度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哲学价值观批判和政治批判相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这就要求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 树立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 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 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启示是, 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理论, 破除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维护中国环境权和发展权的同时,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 摆脱生态文明理论上的西方霸权话语, 建立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的中国话语的生态文明理论。

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清理, 我国学术界摆脱了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西方霸权话语的束缚, 不仅开始挖掘和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理论, 而且抛弃了生态中心主义思潮的后现代研究范式和现代人类中心论思潮以资本利益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 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以此为基础, 学术界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

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对本国和被殖民国家造成的生态问题，并特别注重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所提出的“物质变换裂缝”概念的生态内涵，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只有用一种合理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学术界进一步展开了对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和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学术界把苏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归结为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布哈林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强调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指出地理环境会通过生产力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突出了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列宁则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他坚持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强调人类在认识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应当尊重自然。另外，列宁批评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环境问题的产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注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循环利用生态资源；布哈林的生态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他的平衡论上。他所说的平衡论是在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界的依赖的同时，也强调人类社会在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二者关系的平衡。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首先开始于对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看法。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坚持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指出应当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具体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如何保护生态和维持生态平衡的问题上，毛泽东较早提出了植树造林、节约生产和消费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邓小平提出了通过植树造林、制定严格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和可持续发展的论题等来保持生态平衡的思想；江泽民则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思想，强调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并进一步提出开发与节约并举，坚持对科学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制定严格的生态法律法规和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胡锦涛则进一步提出了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方式应当从牺牲和破坏环境的粗放型发展转向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协调的发展方式转变，并提出了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提出了建设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和谐社会主张，并强调应当通过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制定完善的生态法律法规，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要手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主要探讨了下列五个问题。具体来说：

第一，强调习近平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提出了“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构成他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哲学世界观。“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且还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持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

第二，习近平生态思维方式除了具备系统性、整体性、辩证性等生态思维方式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备了遵循生态系统规律和生态治理的战略思维、协同治理生态问题的辩证思维、刚性约束人们实践行为的法治思维、维护生态安全的底线思维的特质；

第三，习近平关于保护环境也是保护生产力的论述、“两山理论”的论述，突破了把生产力规定为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的传统思想，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秉承的是一种

环境生产力论;

第四,注重揭示习近平的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的特质。与西方生态治理观或者像生态中心主义主张单纯的德治主义生态治理观,或者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倡导多方合作的合作治理观,注重倡导制度层面的设计,片面强调技术主义生态治理观不同,习近平主张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所谓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就是摆脱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的西方霸权话语,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既制定严格的生态治理制度,又强化生态价值观的建设和重塑,把外在的制度硬性规定和内在的道德自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它使得习近平的生态文明理论呈现为一种发展观与境界论有机统一的特点;

第五,揭示了习近平的环境正义理论。习近平的环境正义理论不仅体现在他提出了人与自然能否实现和谐关系,关键取决于是否能够通过制定严格的生态法律、法规、生态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制度,正确处理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使用问题上的矛盾利益关系,确立“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并提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环境民生论”,而且体现在他提出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上。习近平提出,应当根据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确定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义务,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展开全球环境治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家园,决定了所有民族国家都应当承担呵护地球家园的“共同责任”;当代全球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而且发达国家具有经济发达和技术先进的优势,必须承担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治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环境正义价值取向的环境治理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确立了以“命运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以系统和整体思维为特征的生态方法论,以德法兼备和环境正义为价值取向的生态治理观,而且正确处理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种超越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把生态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技术运用对立起来,主张排斥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的经济零增长,以维护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和既得利益;现代人类中心论虽然强调通过技术革新实现经济增长,但他们主张的经济增长的结局是资本的可持续发展,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发展,不是一种我们应当追求的“真发展”;习近平的生态文明理论则主张通过走技术创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既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又强调世界各民族国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and 走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全球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习近平的生态文明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全球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从独尊教科书体系,到反思、批判教科书体系的教科书改革范式与后教科书范式,理论主题经历了从对主体性的追寻到对主体性的反思,其结果是破除了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体系哲学,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现代实践论哲学,不仅真正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有机联系,而且开启了诸多与实践密切相关的专门化哲学。上述变化不仅体现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特质。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述特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机结合的结果,是21世纪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 [1]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 葛兰西文选(1916—1935)[M].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3] 孙正聿. 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4] 陶德麟. 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5] [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的辩证法[M]. 渠敬东,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6] 王雨辰. 伦理批判与道德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7] 任平.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From the Pursuit of Subjective Philosoph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ized Philosophy

—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Philosoph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Yu-chen, CUI Yu-juan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tudy of Chinese Marxism philosophy has reflected and criticized the “material-oriented”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the modern rationalist philosophy, which leads to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textbook system to the reform of the textbook system and post-textbook paradigm. It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ing process from the pursuit of subjectivity to the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which turns Marxism philosophy into a kind of problem-oriented modern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forms many specialized philosophies dealing with the practical issues. When it comes to its influences, it not only greatl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space of Chinese Marxism philosophy, but also establish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world of Chinese peopl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signification of Marxism philosophy is to exert its criticalness, practicalness and openness, 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ident Xi in new era is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this combination as well as the Marxism theory of Chinese for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Chinese Marxism philosophy; specialized philosophy;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President Xi’ s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刘传红)